

总第 10 期 **Total :Volume X**

2011 年辑第 2 期 **Volume II 201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 · 友情赠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hina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GDUFS

广州 · 2011 年 4 月

April 2011 Guangzhou

目 录

- 1.大萧条的经验：货币政策之绳并非不能推车.....刘巍 4
Experience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Monetary Policy Can Also Push the Economy Cart

Liu Wei

内容提要：大萧条时期的英国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在需求约束型的萧条经济中发挥启动作用是可能的，但要必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从金融角度观察，银行系统基本安全、货币有充分的供给弹性和证券市场正常运行；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至少不被政策打压。而近代中国的经验表明，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货币政策足以治理输入性的萧条。对美国的分析可以看出，胡佛总统时期由于上述条件不存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样无效。罗斯福总统在修复经济机制的同时实施的国家干预政策是政治上的唯一选择，不是经济调控手段的唯一选择。

Abstract: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dicates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monetary policy plays an initiation role under depressed demand restricted economy; however two essential conditions must be meet. Financially speaking, essential security banking system, sufficient elasticity of money supply and good running security market are required; seen from the aggregate demand,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and overseas should at least not be suppressed by policies. Howeve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 China indicates that, monetary policy can fully improve the imported depression under supply restricted economy. The analysis of America can show that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are equally result-less since above mentioned conditions can not meet at the period of president Hoover.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no political alternative when he repaired the economic mechanism and enforced dirigisme at the same time, but he did have economic alternative.

- 2.对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研究的几个问题之简单评述

——基于计量经济史角度的管窥.....陈昭 15

Simpl Summary on the Questions of Morde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From the View of Cliometrics Studies

Chen Zhao

内容提要：1979 年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涉猎较广，史料发掘利用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和国外学者对经济史学的研究差距很大，其本质区别体现在是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还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主要问题在于，第一，缺乏经济学逻辑分析，仅凭朴素的个人感觉得出结论；第二，简单套用经济学逻辑，药不对症；第三，以点代面，以简单举例法代替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

Abstract: Since 1979, the clinometric studies in china mainland have broadly studied on the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so collecting and ed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tudies have made big progress. But from the method of studies on economic history,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s studying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be based on historic method or on economic method. The main problems are: first, lacking economics logic analysis, only depending on the simple individual feeling to draw the conclusion. Second, applying mechanically the economic logic, the result is the medicine is not just right for the illness. Third, taking a part for whole and using a simple case method, no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3.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前提是供给约束型经济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态势的讨论.....陈昭 叶景成 21

The Premise of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is Supply-constraints System--The discussion based on Chinese Economics Syste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Chen Zhao Ye Jingcheng

内容提要：“贸易条件恶化论”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这一前提假设，当经济态势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时，“贸易条件恶化论”已不再适用。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不存在必然联系，往往是贸易条件恶化而贸易利益增加。在运用“贸易条件恶化论”评价一国国际贸易绩效和国际贸易利益时，应当谨慎考察“贸易条件恶化论”赖以成立的经济环境和前提假设与该国经济现实是否相符。

Abstract:The premise of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is supply-constraints system. When the world turns to demand-constraints system,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no longer applies. Under demand-constraints system, there aren't any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terms of trade and trading gains, terms of trade deteriorates while trading gains increases. When using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to evaluate international trading performance and trading gains, we must make sure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conforms to its premise.

4. 陋室随笔：Cliometrics研究者的起步“装备”与研究目标.....刘巍 30

Essay on the Basic Necessity and Research Target of the Cliometrics studies Liu wei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计量经济史研究者起步的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笔者以为，要有四个本事：历史学的阅历——经济史实；经济学的修炼——经济理论；数学的功底——计量方法；统计学的技能——经济数据。第二，计量经济史研究的目标什么？笔者感觉有二，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和修正某些经济学理论。前者虽难但稍显容易，后者难上加难，是计量经济史研究的高尚境界。

Abstract: Two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on one hand, what capaciti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cliometric researchers at the beginning? As far as I know, four kinds of capacities: 1. history especially economic history; 2. economy especially economical theory; 3. math especially econometrics; 4. statistics especially economic data.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s cliometric research for? Two aspects: one is to search for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Chinese economic problems; the other is to improve and rectify some economic theory. The former is hard but easier, and the latter is harder which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cliometric research.

大萧条的经验：货币政策之绳并非不能推车^①

刘 巍

内容提要：大萧条时期的英国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在需求约束型的萧条经济中发挥启动作用是可能的，但要必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从金融角度观察，银行系统基本安全、货币有充分的供给弹性和证券市场正常运行；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至少不被政策打压。而近代中国的经验表明，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货币政策足以治理输入性的萧条。对美国的分析可以看出，胡佛总统时期由于上述条件不存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样无效。罗斯福总统在修复经济机制的同时实施的国家干预政策是政治上的唯一选择，不是经济调控手段的唯一选择。

关键词: 大萧条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美国 英国 中国

自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问世以来以来，货币政策被喻为一根绳子，“只能用绳子拉车而不能用绳子推车”的逻辑被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所接受，财政政策（政府直接购买为政策的主要内容）似乎成了治理衰退的首选王牌。各种理论模型逻辑推理都极其缜密和无懈可击，本文不一一点评。但是，这些理论前提假设都是从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状况中抽象出来的，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却较少涉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同是发达国家的英国几乎没有动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样起到了反衰退的作用；中国走出经济低谷也仅仅使用了货币改革政策。于是，我们的疑问就产生了——美国经验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货币政策启动经济无效的逻辑是不是普遍适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点历史的和逻辑的讨论，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有效的充要条件分析

（一）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分析

1929~1933 年爆发的大萧条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危机应该发生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国家。我们曾用数量方法对英国经济数据做过测算,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起,就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刘巍、陈昭,2010)。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基本机理可用图 1 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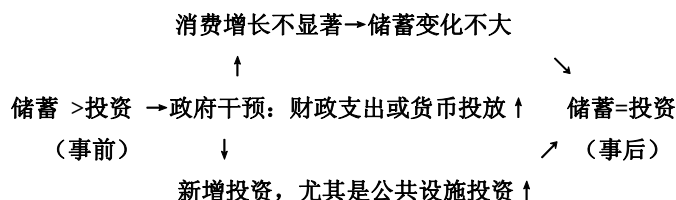


图 1 “有政府干预的需求约束型经济”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

^①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87~1936年中国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因素研究》(09BJL006)的中期成果。

1930年第一季度,受美国大萧条的影响,英国经济步入萧条期。与美国不同的是,萧条的次年1931年,英国经济便跌到了谷底,1932年夏秋之后开始止跌回升,1934年便超过了1929年的产出水平。在危机期间,英国在利率杠杆的调节下,投资复苏,失业率从1933年开始逐步下降。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经济是稳步增长的,见表1。

表1 1929~1939年英国宏观经济数据 单位:百万英镑

年份	实际Y	货币量	P 1929=100	利率 %	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
1929	4127	2616	100.0	4.60	782	815
1930	4098	2638	99.2	4.46	814	858
1931	3810	2606	96.0	4.53	819	851
1932	3838	2666	92.5	3.76	833	827
1933	4007	2804	91.1	3.38	770	809
1934	4350	2818	90.4	3.08	785	805
1935	4471	2912	91.2	2.98	829	845
1936	4703	3100	91.6	2.94	889	897
1937	4786	3244	95.2	3.38	909	949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62~889页。

数据显示,萧条期间的英国经济1932年就开始止跌回升了,且总产出环比下降的幅度最高为7%,物价环比降幅最大为3.6%,美国则于1934年经济复苏,总产出环比下降的最大幅度为13%,物价环比最大降幅为10.4%。美国经济复苏不仅比英国晚了两年,而且衰退的幅度远大于英国。英国走出危机的宏观调控主要手段是货币政策,美国则是在货币政策失灵之后主要动用了财政政策。换言之,英国的“绳子”可以推车,美国的“绳子”却无力推车。货币政策之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推车?我们先从英国经济史角度考察其原因。

1. 英国金融体系运转基本正常

(1) 英国的银行体系健全

大萧条期间,英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是安全的,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银行倒闭悲剧,货币政策有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于是,利率政策可以调节货币量,保证了英国的商业银行存款(表2)和货币总量(表1)保持增长态势(仅在1931年有小幅下降)。我们知道,商业银行存款大多是银行贷款派生的,商业银行存款的趋势反映了一国经济是否在升势中运行。商业银行肯于贷款,说明经济预期还不是很糟的,商业银行存款上升,说明银行家们对经济还有信心。同时,商业银行存款的趋势也反映了商业银行本身的状况,如果一国商业银行不断倒闭,商业银行体系忙于回收贷款,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时不会呈上升趋势的。

表2 大萧条期间英国商业银行存款 单位:百万英镑

年份	英国商业银行存款	年份	英国商业银行存款
1929	1152	1933	1248
1930	1201	1934	1287
1931	1064	1935	1406
1932	1210		

资料来源: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页。

银行体系的稳定和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它他是一国总需求的最后保证，是一国货币政策起作用的物质基础。在商业银行体系稳定的基础上，银行家们的信心就代表了全社会对宏观经济的信心。银行家们的信心表现在贷款方面，其实，要论公众的信心指数，最重要的当属商业银行的信贷指数，这是实实在在的，其他方面的调查都可能言不由衷或有水分。

(2) 英国保证了货币有充分的供应弹性

1931年9月21日，在关键时刻断然决定英镑与黄金脱钩，废除金本位制。这一举措使英国的货币量不再受金准备的制约，保证以充足的货币量刺激总需求。同时，利率调节有了足够的空间，不再担心黄金储备外流。

(3) 英国证券市场正常运转

大萧条期间，英国的证券市场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依然有效，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在，可以保证货币政策顺利到达实体经济。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大萧条期间英国都是正常的或调整及时的，与美国有重大区别。

2. 英国总需求没有受到政策抑制

(1) 国内投资需求

凯恩斯经济学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储蓄在收入中的比例是递增的，于是，投资能否消化储蓄就成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国家的重要问题。所谓“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衰退和繁荣都是以投资为标志的。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没有出现类似柯立芝繁荣的美国式辉煌，没有过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且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过大小三次经济衰退，工业领域内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像美国那样严重。遭受危机打击较为严重的是英国的农业和对外贸易，以及英国黄金储备流失。对于英国来说，输入性的大萧条对经济虽有打击，但货币政策足以拉动总需求。同时，英国的税收政策虽无松动，但也没有像胡佛总统时期的美国那样做出南辕北辙的政策举动，因此，对国内投资来说，经济政策至少是中性的。

(2) 需求约束态势下的国外需求

1931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废除金本位制之后，1英镑从4.86美元跌到3.40美元，英镑纸币大幅度贬值，汇率可以浮动，保证了英国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同时，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英国彻底抛弃了自由贸易，重操保护关税政策。针对美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从1931年开始，英国先后颁布了《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农产品法》和《进口税法》，最高关税税率可达100%。1932年7月，英国和各自治领在加拿大首府渥太华召开了帝国特别会议，讨论经济贸易问题。在会议上，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帝国特惠制”。渥太华会议使得英国不仅扩大了与各自治领的贸易，也加强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的竞争力（成、刘金源、吴庆宏，2005）。英国的外贸政策保证和扩大了出口，增强了外部需求，这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是积极的政策。

(二) 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分析

我们做过的数量分析结果显示，大萧条期间，中国经济处于供给约束态势之下（刘巍，2010），本来不该受到“生产过剩危机”的困扰。但是，罗斯福政府的白银收购政策使中国作为货币的白银滔滔外流，货币大幅紧缩，国内产业凋敝。在中国银本位制度下，由于中国不是产银国，货币供给量一直受国际市场银价的左右，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中国的GDP总是随着白银流动上下起落。国内金融恐慌导致的经济大滑坡，使国民政府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几经犹豫，但最后终于选择了纸币制度。1935年11月，法币诞生了，完成了近代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此，中国的经济当局才具有了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功能，才有了实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1936年是中国实行纸币制度的第一年，中、中、交三行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的货币供

给，银根见松，银行拆息下落且平稳，物价、产量均呈上升趋势。按现有资料来看，这是近代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也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之一（参见：刘巍、王若阳，2009）。

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何有能力放松银根，从而启动经济？我们认为，中国当时属“供给约束型”经济，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有效的，供给约束型经济是问题的关键。供给约束型经济的基本逻辑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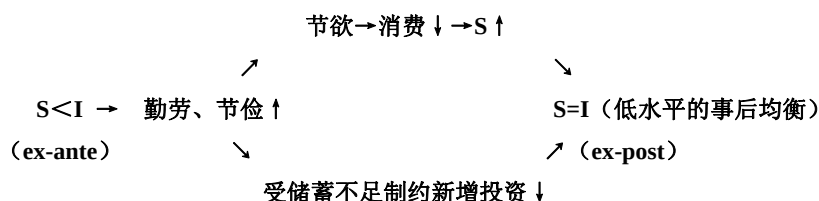


图 2 “供给约束型经济”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

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企业产品的销售不是问题，往往还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势。我们今天犹记中国 1978 年以前“凭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岁月，在短缺的态势下，残次品都有销路。因此，银行体系不会因预期收不回本息而“惜贷”。在大萧条中，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只要银行有钱可贷，信贷就会自动创造供给，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二、美国货币政策实施条件的缺失

我们曾用数量方法测算过，美国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是在 1920 年左右（刘巍、陈昭，2010），远远晚于老牌的世界经济龙头英国。托马斯·伍兹对美国大萧条做了这样的描述：“1929 年的股市崩盘，把繁荣的 20 世纪 20 年代扔进了一个天塌地陷的结局中。从 1929 年到 1933 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落了 30%。最惨的时候，失业率攀升到不可思议的 25%。1931 年、1932 年和 1933 年，税后的企业利润其实是负数。20 世纪 30 年代的私人净投资也是负数——就是说，厂房和设备磨损得比更新还快（托马斯·伍兹，2008）。”经济学家彼得·特明则从宏观上对大萧条做了定量的概括：美国的经济活动从 1929 年中期到 1933 年初的几个月持续衰退。长达 4 年的衰退并不是平稳的，但经济产出的下降却是空前的并令人困惑。工业产出下降了 37%，价格下降了 33%，实际 GNP 下降了 30%，而名义 GNP 下降了一半以上。失业率上升到 25% 的最高峰，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其他年份中一直保持在 15% 以上。美国的许多经济资源被闲置了整整 10 年，只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就业才增加了，并足以吸纳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恩格尔曼，2008）。

1. 美国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

（1）美国的银行体系发生危机

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接连倒闭（表 3），没有倒闭的银行纷纷自保，货币政策已经不知向何处发力，货币政策怎么可以“推车”？阿特利·波莫林 1932 年 11 月指责那些不愿贷款的银行家们“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寄生虫”（拉斯·特维德，2008）。但是，阿特利·波莫林不明白，身在经济萧条中，银行家们“惜贷”寻求安全是理性选择。大萧条以来的银行倒闭浪潮在时刻提醒着还“健在”的银行的经理人员，不可贸然放款。于是，商业银行存款直到 1933 年方见谷底，到 1934 年才有像样的环比回升（见表 4）。

表3 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银行状况

年 份	银行总数	破产银行数	破产率 (%)	坏账率 (%)
1930	22172	1350	3.48	1.40
1931	19375	2293	7.62	2.87
1932	17802	1453	3.64	1.73
1933	14440	4000	20.2	7.84

资料来源：陆甦颖：《经济衰退的历史答案：1920年代美国经济的多维研究与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9页。

表4 英美两国经济震荡程度比较（上年=100）

年份	美国			英国		
	环比 Y	环比 Ms	环比 P	环比 Y	环比 Ms	环比 P
1930	91.4	94.3	91.7	99.3	100.8	99.2
1931	93.6	88.0	89.6	93.0	98.8	96.8
1932	87.0	92.7	94.9	100.70	102.3	96.4
1933	98.7	97.5	103.1	104.40	105.2	98.5
1934	110.8	115.2	102.2	108.6	100.5	99.2
1935	108.9	118.4	101.5	102.8	103.3	100.9
1936	113.0	114.4	103.6	105.2	106.5	100.4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后，当务之急就是抢救银行。3月6日，罗斯福总统命令全国银行停业4天，以便通过立法进行整顿。3月9日，国会在4个小时内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财政部按照《紧急银行法》迅速采取行动，根据相对健全程度将全国银行划分为四类，其中具有全国存款90%的银行被认为是健全的，并允许它们在3月13日、14日、15日复业，对基本健全的银行进行扶持。从1933年3月至1935年7月，对6468家基本健全的银行提供30多亿美元的资助；同时，清理和关闭了2352家偿付能力不健全的银行。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已有10余亿美元回流到银行，储蓄超过提款，黄金也被储藏者陆续送回联邦储备银行，银行度过了危机。

（2）美国货币缺乏有充分的供应弹性

美国在胡佛总统时期一直抱定金本位不放，货币供应弹性太小，为保证黄金储备不外流，竟几次使贴现率变动的方向与放松银根的努力相反——实行了紧缩政策（见表5），货币政策当然不会奏效，商业银行存款一路下滑（见表6）。

表5 20世纪20~30年代初美国的货币政策

时 间	放松银根	紧缩银根
1929年10月	买入1.2亿美元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至5%	
1929年11月~1930年12月	买入4.4亿美元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至3%	
1931年1~8月	买入1.3亿美元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至3%	
1931年10~11月		提高贴现率至4%
1932年1~8月	买入111万美元政府债券，降低贴现率至2.5%	
1933年		提高贴现率至3.5%

资料来源：陆甦颖：《经济衰退的历史答案：1920年代美国经济的多维研究与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169 页。

表 6

大萧条期间美国商业银行存款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美国商业银行存款	年份	美国商业银行存款
1929	25160	1933	16019
1930	25648	1934	17796
1931	22569	1935	21731
1932	17111		

资料来源：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7、659 页。

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首先试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将美元贬值。继紧急银行法之后，他于 4 月 5 日发布行政命令：所有金元、金条或黄金证券须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其他硬币或纸币。两周以后，财政部宣布不再发黄金出口许可证。这就使美国在国内放弃了金本位制，但仍保留货币的黄金准备，允许政府在国际汇兑中支付有限量的黄金。6 月，国会又通过一项联合决议，禁止在任何公私合同中使用黄金支付。

（3）美国证券市场瘫痪

胡佛任商务部长时就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财长决定的低利率贷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威廉·曼彻斯特，2009）。胡佛作为总统一上任就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贷款，接下来立即着手限制股市投机，美联储则以紧缩政策予以配合，试图抑制他所断言的股市投机泡沫（是否股价急剧上涨就是投机泡沫，目前尚无定论）。虽 1929 年当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但将美国股市斩落马下的无疑是美联储的紧缩大棒。从此，美国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不见了，灾难来了。罗斯福总统上任后，一面抢救银行，一面整顿证券市场。美国证券市场于 1933 年 3 月 15 日重新开业。

从金融体系涉及到的三方面情况来看，大萧条的前期美国都是不正常的或调控失败的，只是在罗斯福总统上任后才逐步恢复正常，可惜，这时美国的经济灾难已经相当深重了。

2. 美国的总需求受到政策抑制

（1）国内投资需求受到政策打击

从英美两国的比较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续的经济繁荣必然导致较深程度的调整。美国从 1921 年以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连年的储蓄大于投资对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旦发生不管来自何方的风吹草动，都将成为深度调整的导火索。美国灾难的起点就是胡佛总统鲁莽的紧缩政策和对股票市场的打压，政策弹无虚发，一举击中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枢。国内投资需求的链式萎缩是需求约束型国家经济的巨大灾难，即使金融体系健全、货币政策有效，也恐有较长的时滞方可显现政策效果，何况金融体系已然瘫痪。我们推测，凯恩斯先生的“流动性陷阱”模型暗含的前提假设就应该是金融机制的瘫痪。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无论投放多少货币都会落入“陷阱”，而投资毫无起色。这正是在美国大萧条期间胡佛总统任内的局面。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政策本身自相残杀，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最值一提的是 1931 年 12 月出台了灾难性的 1932 年税法。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率提高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所得税被大幅度调高，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 25% 蹿升到了 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失去了吸引力。

（2）国外需求遭到关税报复的重创

美国在外需方面与反萧条意图最南辕北辙的败笔就是 1930 年 6 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将 25000 多种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 59%。该法在国内、国际上引起的评论、争议和谩骂比有史以来任何关税措施都多，美国的贸易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大门之外，

贸易伙伴国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对等的报复行为。如,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的汽车征收双倍关税。于是,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骤降 90%;法国的报复行动将美国的产品全部关在了法国大门之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对美国汽车征收足够高的关税,以确保美国的汽车在西班牙一辆也卖不出去。各国一个接一个地提高关税壁垒加以报复,国际贸易变成了死水一潭。这一税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出口额从 51.6 亿美元降到了 16.5 亿美元。这一税法使得横扫世界的大萧条进一步恶化,成了真正的全球性灾难(戴斯勒,2006)。

后来还是罗斯福总统改弦更张,1934 年,美国颁布了一个与胡佛时代的《史慕德—哈利法》大相径庭的贸易法——《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该法发起了一场反向的关税运动。该法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谈判和履行双方同意向对方提出的税则进行减税的条约。有了这一授权,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把任何一项美国关税降低 50%。于是从 1935 年开始,美国的国际贸易逐步恢复。

从总需求涉及到的两方面情况来看,在胡佛政府时期,美国的调控政策失败得一塌糊涂。胡佛在任期间,总需求低迷且受到打击,厂商的产品销路严重受阻,销售则成了严峻的生死存亡问题,随着局势的恶化,人们开始卖任何东西——只要能卖得出去,任何价格都可以接受。约翰逊美术馆因破产而出售资产时,毕加索的《超级派对》仅售 400 美元!最能说明其惨烈程度的是,非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也下降了一半(拉斯·特维德,2008)。企业销售困难就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贷款无法偿还一定会拖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只有倒闭或惜贷这两个选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到了商业银行这里就停止了,何来政策的积极效果。史实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在罗斯福总统上任后才逐步恢复正常的。

三、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角度的考察

若想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发挥正常的作用,就必须存在顺畅的政策传导机制。如果传导机制中的某一环节断裂,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必然极不显著。我们从传导机制角度对大萧条中的英国、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做一点分析,从而使我们前面的描述性分析更加一般化。我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各种渠道逐一考察:

1. 利率渠道

凯恩斯主义认为,影响消费和投资决定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对开支产生作用的利率是长期利率而不是短期利率。同时由于实际利率比名义利率对开支影响更大,使得利率渠道在通货紧缩时仍然有效。即:

$$M_s \uparrow \rightarrow \text{名义 } r \downarrow \rightarrow \text{预期 } P \uparrow \rightarrow \text{实际 } r \downarrow \rightarrow I \uparrow \rightarrow Y \uparrow$$

在大萧条中,英国货币与黄金迅速脱钩,货币供给弹性大大提高,中国则通过 1935 年的法币改革放弃了银本位制,两国的, $M_s \uparrow$ 和利率下降都立竿见影,利率渠道是通畅的。反观胡佛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由于固守金本位制,又怕黄金储备流失,不得不时而实行紧缩政策, M_s 一路下滑伴着利率不降反升,利率渠道在起点上就注定被堵塞了。在投资环节上,由于美国税率大涨,就是货币存量能增长,投资也是不会有多大起色的。于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渠道上注定是走不通的。

2. 非货币资产价格渠道

(1) 托宾的q理论

托宾q理论提供了一种有关股票价格和投资支出相互关联的理论,即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其中q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资本的重置价值。托宾q理论的货币传导机制

可表述为：

$$M_s \uparrow \rightarrow \text{股票价格} \uparrow \rightarrow q \uparrow \rightarrow I \uparrow \rightarrow Y \uparrow$$

（2）财富效应渠道

莫迪利亚尼利用生命周期模型的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决定消费支出的是由消费者毕生的资财决定的，消费者毕生资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财富，而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普通股。其货币传导机制为：

$$M_s \uparrow \rightarrow \text{股票价格} \uparrow \rightarrow \text{财富} \uparrow \rightarrow C \uparrow \rightarrow Y \uparrow。$$

从这两个渠道的传递机制来看，都需要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运行的股票市场。大萧条期间，英国的股票市场是基本正常的；而美国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起就基本上处于半停顿状态之中了，直到罗斯福总统上任才恢复营运。因此，英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传导到实体经济，而美国的 M_s 即使可以增长，由于这两个渠道发生了淤塞，货币政策也难以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国当时由于股票市场不健全，在大萧条之前也不存在这一传导机制，另当别论。

（3）汇率渠道

汇率可视为外汇资产的价格，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浮动汇率的出现，汇率对净出口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M_s \uparrow \rightarrow r \downarrow \rightarrow \text{汇率} \uparrow \rightarrow NX \uparrow \rightarrow Y \uparrow$$

英国由于及时地放弃了金本位制，货币量、利率和汇率都能灵活调整，“帝国特惠制”又保证了英国的出口不至于衰退，所以，这一渠道是畅通的。中国的法币改革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出口保障了进口（资本品），进口保障了经济增长。美国固守金本位制，不仅货币量、利率和汇率是僵硬的，而且1930年6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又给出口雪上加霜，这一渠道必然走不通。

3. 银行信贷渠道

货币供应扩大增加了银行贷款的可供量。其传导机制为：

$$M_s \uparrow \rightarrow \text{贷款} \uparrow \rightarrow I(C) \uparrow \rightarrow Y \uparrow$$

如前所述，英国、中国的银行体系都是正常运行的，前者放弃金本位制、后者法币改革都促进了 M_s 的增长和信贷的增长，该渠道畅通。美国的银行体系危在旦夕，银行家以收紧银根而自保，同时，税率的大幅度提高又沉重打击了国内投资，该渠道必然失灵。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各条渠道始见通畅，但是，市场的信心已经低到了冰点。

还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各条渠道的末端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环节传递到GDP的，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其他政策配合货币政策，至少不能在实施积极货币政策的同时有打击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经济政策存在。前面的讨论表明，在胡佛总统时期，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出口方面都有压制投资和出口的严厉政策，“绳子不能推车”在当时的美国是必然的。

四、结论

1. 货币政策启动经济的条件是经济机制正常运行

从前面对大萧条时期的英国和中国的讨论来看，货币政策在需求约束型的萧条经济中发挥启动作用必须有几个条件。从金融角度观察，银行系统基本安全、货币有充分的供给弹性和证券市场正常运行；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至少不被政策打压。而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货币政策足以治理输入性的萧条。

2. 经济机制不正常时财政政策也不能“推车”

在美国胡佛总统时期，货币政策不灵，那么，财政政策就可以把美国经济拉出萧条吗？我们再考察一下胡佛总统的财政政策。从表7可以看出，胡佛政府在大萧条爆发后的第一年1930年的中央财政收支状况和繁荣时期还是一致的，并未因萧条而大举动用财政手段。从1931年起，支出大于收入，但当年的收支率仅为114.79%。1932年，收支率达到了242.15%，甚至高过了著名的国家干预专家罗斯福总统时期。

表7 美国中央政府财政收支总额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支出	3127	3320	3577	4659	4598	6648
收入	3862	4058	3116	1924	1997	3015
收支率(%)	80.97	81.81	114.79	242.15	230.25	220.50

资料来源：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1、699页。
收支率=支出/收入。

1931~1932年，胡佛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不可谓不积极，为什么没有效果呢？我们初步分析的结论是这样的：财政政策发挥效果，无非是启动经济，而不是也不可能由政府取代市场，所以，问题最重要的方面仍是市场本身。市场中的金融机制毁损，总需求遭到打压，接下来二者便互为因果，衰退愈演愈烈，政府购买得不到市场经济的配合，宏观经济乘数效应极不显著，自相矛盾的财政政策之命运自然也和货币政策一样下场了。换言之，如果经济机制本身不能正常运行，财政政策也是不能“推车”的。

从前面一节的讨论看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首先是修复市场机制，革除压制总需求的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效果才日渐显著。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修复动作，他的财政政策效果也可能和胡佛总统大同小异了。如此看来，如果不修复金融机制，罗斯福总统也不能带领美国走出凯恩斯先生的“流动性陷阱”。

3. 使用财政政策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选择

在修复经济机制的同时，罗斯福总统沿用了胡佛总统的财政政策手段，这在近代西方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所以，称其为“胡佛—罗斯福新政”也不过分。经济机制逐步修复条件下的政府购买和其产生的乘数效应使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市场信心逐渐恢复。新政使美国人逐步从失望中走出来，开始有工可做，罗斯福成了自林肯以来最得人心的美国总统。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罗斯福总统最受欢迎，上帝其次，但上帝得票远不如他（威廉·曼彻斯特，2009）。

小学生们的态度显然是深受父母、亲人和老师影响而产生的，而且是反复听说才会记住，他们自己应该不知道经济复苏是怎么回事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了美国人久受大萧条之苦后的急切心态，表明了美国人给罗斯福总统的时间不多，他必须尽快拿出政绩来。罗斯福上任时，美国人已经在大萧条中煎熬了三、四年了，仅用货币政策中的货币量或利率手段调节（经济机制被修复条件下），等待市场机制慢慢将美国经济从深谷中拉出来，而财政政策不去作为，显然是罗斯福总统不能选择的。如果说，从经济角度看罗斯福总统的调控手段有货币和财政两种政策选择的话，那么，从政治角度看他只有财政政策一种选择。

4. 大萧条的启示：不必动辄使用政府购买手段治理衰退

历史经验表明，市场配置资源往往效率高于政府直接干预，政府购买为主的财政政策效率不高，且比其他调控方式更极易滋生腐败。同时，政府购买为主的财政政策只能救命不能治病，且大都会加重经济结构不良的病症，极其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只要银行体系运转正常，灵活的纸币制度正常，证券市场融资功能正常，总需求没有受到人为抑制，以货币政策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是可以奏效的。

诚然，某些新兴国家因改革不到位而存在着市场机制某些环节的梗塞，如市场准入制度方面有问题，存在着某些高度垄断的行业；地方保护严重，存在着市场分割弊端；分配不公，存在着某些人口众多的阶层需求低下的窘况，等等。^①但是，这些都不是动辄使用政府购买手段的理由，而是应该利用衰退时机做点事，趁机清除这些市场机制的梗塞。众所周知，平日里改正这些弊端应该是阻力较大的，但在世界规模的衰退将临时，拯救国家经济至上，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与其政府大把挥金，不如清除市场机制的梗塞，然后减税、降息。一次经济衰退就是一次完善市场机制的机会，而成为不应加重梗塞的借口。政府花钱当然比改革容易，几乎没有阻力，结果是表面上抑制了衰退，但隐患更大——过剩的产业更加过剩和短缺的产业依然短缺，这是对民族和国家不负责任的。

参考文献：

- 1.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第 190~192 页。
- 2.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 2005，第 311~314 页。
- 3.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财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 4.刘巍、王若阳：《银根紧缩、银根放松与放而不松——大萧条时期中美货币政策比较研究》，《阅江学刊》2009 年创刊号。
- 5.托马斯·伍兹著，王祖哲译：《另类美国史》，金城出版社 2008，第 129~130 页。
- 6.恩格尔曼等著，蔡挺等译：《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第 218 页。
- 7.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信出版社 2008，第 85 页。
- 8.威廉·曼彻斯特：《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海南出版社 2009，第 26 页。
- 9.戴斯勒著，王恩冕、于少蔚译：《美国贸易政治》，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第 301 页。

作者简介：

刘巍，男，1960 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历史学硕士，1998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史。

手机：13929525214

办公电话：020-36641251

电子邮箱：ssxx1975@mail.gdufs.edu.cn; 13929525214@139.com

通信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① 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不做深入分析。

Experience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Monetary Policy Can Also Push the Economy Cart

Abstract: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dicates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monetary policy plays an initiation role under depressed demand restricted economy; however two essential conditions must be meet. Financially speaking, essential security banking system, sufficient elasticity of money supply and good running security market are required; seen from the aggregate demand, the demand for investment and overseas should at least not be suppressed by policies. Howeve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 China indicates that, monetary policy can fully improve the imported depression under supply restricted economy. The analysis of America can show that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are equally result-less since above mentioned conditions can not meet at the period of president Hoover.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no political alternative when he repaired the economic mechanism and enforced dirigisme at the same time, but he did have economic alternative.

Key words: the great depression monetary policy fiscal policy the U.S.A the U.K China

对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研究的几个问题之简单评述

——基于计量经济史角度的管窥

陈 昭

内容提要：197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涉猎较广，史料发掘利用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和国外学者对经济史学的研究差距很大，其本质区别体现在是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还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主要问题在于，第一，缺乏经济学逻辑分析，仅凭朴素的个人感觉得出结论；第二，简单套用经济学逻辑，药不对症；第三，以点代面，以简单举例法代替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

关键词：近代中国 国际贸易 计量经济史 研究方法

现代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范式，即“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结论与对策”。对于前提假设而言，到现在为止，任何经济理论都有自身的限定条件，离开假设条件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以来某一特定前提下的同类经济现象中逻辑规律的抽象，而应用经济学逻辑框架对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事件的解释都需要有该时段全部时点上的经验的支持。换言之，经济学研究只接受两种批评——逻辑的和经验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验批评科学化的过程，即从举例法到计量经济学方法转变的过程。正如李子奈教授所说“在我国，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一种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为例，我们对1984—2006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100余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重，1984年为0%，到1998年为11%，然后迅速提高，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年为53%。这个比重已经超过美国同类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同期的水平。而且研究对象遍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所应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计量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其他经济类刊物，例如《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等，无不如此。在经济学门类各个学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为了提高和体现论文的学术水平，建立与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有这些，是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其主流必须予以充分肯定。”^①

1979年以来，大陆学界对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不仅范围广泛，形式多样，逻辑分析透彻，而且集中度较高，史料翔实，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但是，作为理论经济学项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却基本上以史学方法为主，绝大部分不符合经济学的分研究范式。从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目前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不在国际贸易学的逻辑框架内分析问题，思路展开的主要依据是研究者朴素的历史感觉，漏

^①李子奈. 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总体回归模型设定[J].经济研究, 2008(8), 第136页.

洞较多。第二,运用国际贸易学逻辑分析时,不考虑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限制,不对这些限制进行理论的抽象概括而形成前提假设,而是将现代经济理论搬来即用,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逻辑推理是建立在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不考虑特定时空的特定条件之逻辑推理,则容易出现“想当然”的逻辑错误。第三,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史料翔实——这是好的方面。可是,仅凭一两件案例分析就得出结论的文献,也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或者说既不能对理论逻辑证伪,也不能证实。没有前提假设的限定,没有特定时空条件的逻辑分析,仅凭案例的实证,其结论也不言而喻。

197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经济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中,这样的文献比较常见,恕不逐一列举,我们尝试以几个文献为例进行一点简单分析,一孔之见,贻笑大方,如有冒犯,还望海涵。

一、逻辑有误之案例分析

王永起(2004)认为甲午战后到1931年,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各个时期的发展与国内外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始终联系更大,政治形势影响也不小,而中国海关税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实际影响总是相对次要的,其作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同时,低关税在特定时期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积极作用。

该文将近代中国海关税率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阐述了每个阶段税率的变化情况,其中用数据表表示出贸易量、贸易额的变动,然后便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我们看来,全文缺少理论的前提假设——海关税率对对外贸易(贸易额还是贸易量,还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引用者注)的影响条件是什么?在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这是其一。其二,理论逻辑是什么?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其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其三,仅用两个数量关系的数值变化就说明两个数量的何种关系?这不是证实过程,也不是证伪过程。如此看来,其结论也显得勉为其难。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分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税率变化的特定条件,进而抽象出前提假设,比如:开放经济条件——保障贸易的可行性;需求约束经济态势——保障贸易的现实性;市场机制假设——保障贸易的公平与机会均等;忽略运输成本——其它条件不变;没有贸易壁垒——其它条件不变;市场是统一的而不存在着分割——保障流通性等等。然后据此,若符合假设条件,则按照假设条件进行逻辑分析,进而建立模型。否则,修改假设条件,进而建立符合近代中国经济条件的两个变量关系的理论模型。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模型应该是多变量的,绝不是该文中所提及的仅仅涉及两个变量的关系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用计量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寻找两变量的关系——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影响多大?——主导作用还是次要作用?据此得出结论——结论是唯一的并且可以再验证。这就避免了该文“拍脑袋”结论的随意性。

二、逻辑框架错误之案例分析

吴柏均(1988)认为影响近代中国粮食进口贸易并决定其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及其体现的各主要粮食输出国粮食经济局势,以及国际粮食商人资本对中国的粮食倾销活动。

该文较前文规范之处是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粮食供求状况这一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因素。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将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框架的高度,虽然其分析得出近代中国粮食属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类型的经济态势,最后没有总结出近代中国粮食市场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的前提假设。除此之外,同前文一样,均没有提炼

出一些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前提假设。除了上文提及的假设条件外,研究此问题的另一些假设是:外国粮食市场属于需求约束性经济态势——保障有剩余产品可以出口;运力没问题;近代中国粮食市场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有需求但生产不出来;中国的GDP(或者人均收入)没问题——中国买得起。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建立模型,然后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最后得出结论。

纵观该文全文,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没有导出理论函数模型的情况下,匆忙对价格(差价)与进口量进行了简单的OLS回归,便得出上述结论。一般来说,不论用经典最小二乘法还是用中高级计量方法做实证,一定应该是对某种逻辑的实证,而这一尚待实证的逻辑,一定是推理的结果,一般表现为一个具备前提假设(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函数。实际上,在不考虑特殊假设的约束时,影响进口的主要因素一般有两个:一是收入状况(是否有钱买?),二是价格或汇率状况(是否买得起?)。也就是说,进口至少是两个因素(变量)的函数,任何省略掉重要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错误都是极其危险的。“这样的关系必然因为因果关系的混乱而导致模型或理论对现实的严重背离”。“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必须遵循“唯一性”原则。对于同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被解释变量,它和所有影响因素之间只能存在一种客观的正确关系。或者说,对于一组被解释变量样本观测值,只能由一种客观的数据生成过程生成。所以,正确的总体模型只能是一个。”“一旦总体模型被设定,利用样本数据进行的经验检验只能发现已经包含其中的哪些变量是不显著的,而不能发现没有包含其中的显著变量;只能发现已经被采用的函数关系是不恰当的,而不能发现没有被采用的正确的函数关系。”^①如果考虑上述之逻辑假设条件,近代中国粮食进口模型将更为复杂,绝非该文所阐述的那样简单,其结论的正确与否就更不得为之了。

三、以点代面之案例分析

姜向哲(1994)认为民国初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及与之相关连的产业结构,包括制造业、矿业、农业及商贸等非生产性产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在这种贸易——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发展带有某些畸形趋向。

该文提供了三个表格:“中外与中日贸易商品结构各部类比(1912-1928年平均值)”,“中国国内总生产结构(1914—1918年平均和1933年)”以及“1913—1920日纱输华变动情况表”。第一张表格数据用——1912-1928年的均值,来说明中日贸易结构的变化。第二张表格用1914—1918年平均数和1933年数据进行比较,来说明近代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张表格,用1913年和1920年日纱输华两个数据进行比较,说明贸易发展状况。

总览全文,姑且暂不分析该文的经济学范式——几乎看不出来,仅就行文本身来说,这是典型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分析思路。在缺少经济主体间动力学的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主观“拍脑袋”认定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动力传递机制的直接性和必然性,这种经济学问题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正常的经济学分析思路是,首先应该明确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作用机理,据此设定正确的总体模型。如果相互之间起作用,则一个衡量标准应该是VAR模型或者联立方程模型。否则,若建立一般的函数模型,从逻辑看来,应该是多元形态。然后,以时段内全部时点上的数据证实或者证伪先前的理论机理。即使仅仅使用统计数据来分析,也绝不应该是两点之间的比较,而应该是趋势分析。

四、有统计数据之名而无统计分析之实的案例分析

^①李子奈. 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总体回归模型设定[J]. 经济研究, 2008(8), 第136-137页.

王方中(1993)探讨了1927-193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进出口商品结构、白银流动与国际收支平衡。

这类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文中用大量的图表数据来证实逻辑。说明情况的较多,理论与逻辑分析较少。一般而言,给出统计数据,是为逻辑分析和实证服务的,至少要体现出“统计分析”,而不仅仅限于数据说明。这样才让人信服其规律、发展趋势以及转折形态。简单的统计描述指标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众数、中位数、标准差等等,复杂一点的包括分布形态、方差分析等。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研究中国近代贸易问题的文献进行分析,我们期望的是更加严谨、更加符合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性论文展现给世人,展现给国内外同行,以免让人对近代中国经济若干问题的研究贻笑大方。我们并不是对上述文献进行批评,而是指出不足,让研究者对近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加翔实周密。当然,经济史学的研究,尤其是统计数据的匮乏,是制约进行数量分析的瓶颈,但是绝不能把缺少数据作为不用规范的研究范式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借口,前辈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正是后学者继承和发展的榜样力量。

五、结束语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①可见,熊彼特认为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三门学问是经济史、统计学和经济理论。在具体谈到统计对经济学的作用时,熊彼特说,“……我们至少在原则上要承认:统计方法是经济分析工具的一部分即使不是为了经济分析的特殊需要而设计的,也是如此。”^②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也曾谈到过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他认为“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统计学对于经济学的重要性已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共识。熊彼特和钱颖一两位先生所说的统计学,绝不是列举几个数据的文章,就算用到了统计学,进而经济史学就算有了统计分析的基础。

当国外计量经济史日臻成熟的时候,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问题是,对一些看来不能定量的,也力求定量分析。所谓看来不能定量,多半是还没找到量算方法。再进一步,还可以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④。10年后,吴先生坚持说:“我一向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能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能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⑤。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序言中写到:“我国史籍一个重大缺点是不注意数量统计,而经济现象如无数量概念则很易走入迷途。不能区别主要和次要、主流和支流。凡能定量者尽可能做定量分析,不能定量者力求找出比例关系。为此,不能不利用各种方法进行估计。估计自不免误差,但终胜囫圇”。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尚不普及,计量经济学人才匮乏,经济史学界对计量经济学的功能认识尚不全面。当时,许涤新先生认为,在

^①约瑟夫·阿·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馆,1991,第30-31页.

^②约瑟夫·阿·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馆,1991,第30-31页.

^③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第4页.

^④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J].晋阳学刊,1982(1).

^⑤吴承明.吴承明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提出的要求是,凡能够定量的,尽可能做一些定量分析,以发现问题,或验证定性结论。许涤新先生说:“不做定量分析,往往流于空洞,抽象化,概念化。不做定量分析,也就可以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局部看成一般,把次要因素当作主要因素。有许多问题,往往争论不休,这就需要定量分析,以求分晓”^①。经济史家刘佛丁先生生前大力提倡计量经济史研究,但是,做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充分的经济数据,这在我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刘佛丁先生认为,“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零散和缺乏,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方法,在这方面经过试验做出成绩,理应成为我国经济史学工作者的奋斗目标,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必须改变。至于少数人视新方法为异端,在对其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浑然无知的情况下,即盲目加以排斥的态度,更是不可取的”^②。

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而是认为,恰恰是传统史学为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充分和充足的论证材料。这方面,绝不是计量经济学所能涵盖的,二者这种互补关系,决定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继承性。

参考文献:

- 1.王永起. 浅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曲折发展与海关税率的变化(1840-1931) [D].东北师范大学, 2004.
- 2.吴柏均.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口贸易的诸因素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1)
- 3.娄向哲.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之关系[J].南开经济研究, 1994 (2)
- 4.王方中. 1927~1937 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A].近代中国 (第三辑): 1993

SIMPLE SUMMARY ON THE QUESTIONS OF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CLINOMETRICS STUDIES

Chen Zhao

ABSTRACT: Since 1979, the clinometric studies in china mainland have broadly studied on the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so collecting and ed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tudies have made big progress. But from the method of studies on economic history,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s studying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be based on historic method or on economic method. The main problems are: first, lacking economics logic analysis, only depending on the simple individual feeling to draw the conclusion. Second, applying mechanically the economic logic, the result is the medicine is not just right for the illness. Third, taking a part for whole and using a simple case method, no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Key words: modern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clinometric studies, research method

^①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3.

^②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作者简介:

陈昭,男,黑龙江庆安人,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史学。

地址通讯: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510420,

联系方式:chenzhao2002@126.com, 13580309162。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前提是供给约束型经济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态势的讨论

陈 昭 叶景成

内容提要：“贸易条件恶化论”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这一前提假设，当经济态势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时，“贸易条件恶化论”已不再适用。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不存在必然联系，往往是贸易条件恶化而贸易利益增加。在运用“贸易条件恶化论”评价一国国际贸易绩效和国际贸易利益时，应当谨慎考察“贸易条件恶化论”赖以成立的经济环境和前提假设与该国经济现实是否相符。

关键词：贸易条件恶化论 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态势 前提假设

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1950）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贸易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趋势。在联合国工作的另一名德国经济学家辛格（1950）也从另一角度阐述了相似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自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久后，巴格瓦蒂（1958）在其基础上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导致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使得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也随之恶化。与此同时，当今许多研究表明我国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张烨（2002）发现1980—2000年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波动中下降，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下降10.4%，平均每年下降0.55%。赵玉敏等人（2002）研究得出，1993—2000年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13%。黄满盈（2006）发现我国的总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李汉等人（2009）发现中国贸易条件以每年4.6%的速度下降。如果按普雷维什（1950）、辛格（1955）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和巴格瓦蒂（1958）的“贫困化增长理论”，中国将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虽然不断恶化，但中国经济却不断飞速发展，这显然与“贸易条件恶化论”和“贫困化增长理论”相违背。为此，本文尝试从“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前提假设出发，探讨这一反态。

一、贸易条件的一般均衡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埃德温·查理说：“任何理论对于经济现实是否具有可用性，取决于这些理论所赖以存在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如果假设与实际基本相符，则通过对某一‘理论’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大量复杂的现实经济的变化。但如果所做的假设与实际不一致，那么，依靠这种理论会把我们引入歧途，从而使经济现实更为神秘莫测。”

①因此，我们在运用“贸易条件恶化论”时，首先必须弄清它所赖以成立的主要前提假设。现在我们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构建贸易条件的一般均衡模型。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由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国际贸易产生于国家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各国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都能得益。模型的基本假定为：1.整个世界经济存在两个国家，A国为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B国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A国专业化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X，B国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Y，两国进行贸易，A国出口X换回Y，B国出口Y换回X；2.A国有 M_A 个劳动者，B国有 M_B 个劳动者，且 $M_A < M_B$ ；A国劳动者单位产量为 q_A ，B国劳动者单位产量为 q_B ，即 q_A 、 q_B 为该国的劳动生产率；3.两国居民的效用函数为： $U_i = (X_i^c)^\alpha (Y_i^c)^\beta$ ， $i=A$ 或 B ；其中 U_i 为该国每个居民的效用水平， X_i^c 、 Y_i^c 为该国每个居民对商品X和Y的消费量，指数 α 、 β 为代表两国居民基于商品X和Y的价格的不同偏好程度，一般情况下商品价格越高，其偏好程度越大，即消费高价格的商品比消费低价格的商品所获得的效用大，由此可推出 $\alpha > \beta$ ；4.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在国际间则完全不流动； p_X 、 p_Y 为国际市场上两种商品的价格，则Y相对于X的价格为 $p_{YX} = p_Y / p_X$ ，也就是B国的贸易条件。

A国单个居民的最优决策问题为：

$$\max U_A = (X_A^c)^\alpha (Y_A^c)^\beta, \text{ s.t. } p_X X_A^p = p_X X_A^c + p_Y Y_A^c, X_A^p = q_A$$

通过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得：

$$X_A^c = \alpha q_A, Y_A^c = (\beta / p_{YX}) q_A, U_A = \alpha^\alpha \beta^\beta (1 / p_{YX})^\beta q_A$$

$$\text{进一步得出, } X_A^s = X_A^p - X_A^c = q_A - \alpha q_A = \beta q_A, Y_A^d = Y_A^c = (\beta / p_{YX}) q_A$$

我们知道，只有A国居民向国际市场供给商品X，需求商品Y。则商品X的总供给为：

$$X^{As} = M_A X_A^s = \beta M_A q_A; \text{ 商品Y的总需求为: } Y^{Ad} = M_A Y_A^d = (\beta / p_{YX}) M_A q_A。$$

同理，B国单个居民的最优决策问题为：

$$\max U_B = (X_B^c)^\alpha (Y_B^c)^\beta, \text{ s.t. } p_Y Y_B^p = p_X X_B^c + p_Y Y_B^c, Y_B^p = q_B$$

通过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得：

$$Y_B^c = \beta q_B, X_B^c = \alpha p_{YX} q_B, U_B = \alpha^\alpha \beta^\beta (p_{YX})^\alpha q_B$$

$$\text{进一步得出, } Y_B^s = Y_B^p - Y_B^c = q_B - \beta q_B = \alpha q_B, X_B^d = X_B^c = \alpha p_{YX} q_B$$

我们知道，只有B国居民向国际市场供给商品Y，需求商品X。则商品Y的总供给为：

$$Y^{As} = M_B Y_B^s = \alpha M_B q_B; \text{ 商品X的总需求为: } X^{Ad} = M_B X_B^d = \alpha p_{YX} M_B q_B。$$

①[美] 埃德温·查理，刘伟译：《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5页

由一般均衡条件可知国际市场出清,即商品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

$$X^{As} = X^{Ad} = \alpha p_{YX} M_B q_B = \beta M_A q_A, Y^{As} = Y^{Ad} = (\beta / p_{YX}) M_A q_A = \alpha M_B q_B$$

由此解得 B 国(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 $p_{YX} = (\beta / \alpha)(M_A / M_B)(q_A / q_B)$

B 国(发展中国家)居民效用函数为: $U_B = \beta(M_A / M_B)^\alpha (q_B)^\beta (q_A)^\alpha$

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即 B 国(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由对商品的需求偏好和 (q_A / q_B) 决定。B 国居民的效用水平不仅与本国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而且与贸易国的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正相关,也就是说,在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下,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都能受惠于对方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两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也就是 q_A 、 q_B 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变和提高,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 B 国为了增加贸易利益就会提高出口 Y 商品的价格, Y 价格上升会使 Y 商品的需求偏好上升,也就是 β 上升,从而 B 国贸易条件改善, B 国居民效用增加,贸易利益增加。反之, B 国降低出口 Y 商品的价格, Y 价格下降使得 Y 商品需求偏好下降, β 下降,从而 B 国贸易条件恶化, B 国居民效用降低,贸易利益减少。如果两国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供给瓶颈已经消除,供给远大于需求,即 q_A 、 q_B 可以根据需求改变和提高。一般情况下, q_B 提高速度要比 q_A 快,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专注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其技术突破要求的成本更昂贵,而发展中国家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其技术突破要求成本相对便宜。也就是说, B 国可以不提高出口商品 Y 的价格,而直接提高供给满足需求,薄利多销,且 q_B 提高速度要比 q_A 快,从而 B 国贸易条件恶化, B 国居民效用水平上升, B 国贸易利益增加, q_B 提高越快, B 国贸易条件恶化越厉害, B 国贸易利益增长速度越快,“贸易条件恶化论”失效。

普雷维什在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时所处的时代供给不足,缺少生产者和生产能力,“贸易条件恶化论”赖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世界经济体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正因为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一国没办法以增加供给来增加国际贸易利益,而只能以提高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来提高国际贸易利益,这样一国的国际贸易利益才能用贸易条件来体现,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贸易利益增加,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贸易利益减少。因此,价格之比才能直接体现为贸易利益之比。然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贸易条件只能表示产品的相对价格之比,价格只是手段,获利才是目的。既然供给瓶颈已经消除,一国增加贸易利益的方法不再单单提高商品价格,降低价格,刺激需求,只要价格下降的幅度小于需求增长的幅度,贸易利益还是可以提高的。因此,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已经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往往是贸易利益不断增加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当今中国大体已经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如果我们继续用“贸易条件恶化论”来分析中国国际贸易绩效和国际贸易利益时,显然会误入歧途。

二、中国经济态势逻辑分析及其理论模型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大体经历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商品短缺明显处于供给约束状态,采购员满天飞,各工厂几乎用不着销售科,就算是残次商品也能卖个好价钱,供给不足体现在各个行业的各个层面上。中国计划经济年代最典型的例证——凭票供应、定额分配,是最能说明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这段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主导着中国经济,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2月北京召开全国“两会”,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粮票、肉票、布票、煤票、购货券等票据一一从人们的生活中慢慢消失,直到1997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最后一批粮票才在北京朝阳区一家粮店里注销。

1994年1月1日,中国取消了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随着市场商品供应越来越丰富,原用外汇券购买的商品现在用人民币都可以买到,外汇券在流通中的特殊作用逐渐取消。从1995年1月1日起,外汇券停止流通,可于6月30日前兑换成人民币。自此,流通了15年的外汇兑换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宣告了中国商品短缺历史的结束。^②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这时期,中国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冷清,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胀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随着市场环境的骤然变化,中国民营企业迎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雪崩之年”,一批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陷入僵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期,全国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现象,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③为此,我们初步估计1996年是中国经济态势转折点,刘巍(2011)的一项研究也明确指出了这个转变节点。1995年以前,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1996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众所周知,马歇尔—勒纳条件是被用来考量一国货币的贬值与该国贸易收支改善程度的关系。马歇尔—勒纳条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所有有关产量的供给弹性为无穷大,也就是供给弹性无穷大,这也就暗含着其理论分析框架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假设之下建立的。马勒条件的基本结论:

1. $E_x + E_m > 1$ 时, 本币贬值可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
2. $E_x + E_m < 1$ 时, 本币贬值会恶化国际贸易收支;
3. $E_x + E_m = 1$ 时, 本币贬值对国际收支没有影响。

其中 E_x 为对出口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E_m 为对进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

若 $E_x + E_m > 1$ 成立, 意味着需求是富于弹性的, 且前提假设供给弹性无穷大, 因而此时的经济体是需求约束型。若 $E_x + E_m < 1$ 成立, 意味着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 即价格对需求量的刺激能力太弱。这看起来似乎是需求的问题, 但实质是供给方面有较大的问题。第一, 出口的外币价格下降, 国外需求不能有效增加, 这说明供给方无力调整出口商品数量和结构, 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 供给弹性无穷大显然是空话。第二, 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 国内替代产品的产量上不来或是根本没有, 更是与供给弹性无穷大无缘。这说明, 当条件 $E_x + E_m < 1$ 时, 该国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我们不谈论 $E_x + E_m = 1$ 的情况, 是因为在现实经济体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 即使发生也是不稳定的, $E_x + E_m = 1$ 不是现实经济体的常态。

^② 新京报社. 日志中国: 回望改革开放 30 年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7: 356.

^③ 吴晓波. 中国巨变: 1978-2008 [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8-7: 88.

我们根据一般的进出口贸易理论建立以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理论函数：

$$EX = f(y_f, e)$$

$$\frac{\partial EX}{\partial y_f} > 0, \frac{\partial EX}{\partial e} > 0$$

其中 EX 表示出口额， y_f 为世界 GDP 指数， e 为直接标价法的汇率。理论函数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国外收入水平越高，出口额就会越大；国内本币贬值，出口商品需求增加，出口额增加。出口额与国外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直接标价法汇率呈正相关关系。

$$IM = f(y, e)$$

$$\frac{\partial IM}{\partial y} > 0, \frac{\partial IM}{\partial e} < 0$$

其中 IM 表示进口额， y 为中国 GDP 指数， e 为直接标价法的汇率。理论函数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中国收入水平越高，进口额就会越大；国内本币贬值，进口商品需求减少，进口额减少。进口额与中国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与直接标价法汇率呈负相关关系。

三、中国经济态势实证分析

我们把中国经济态势实证数据进行整理，如下表。

表 1 中国经济态势实证数据

年份	人民币汇率 e	出口总额 EX	进口总额 IM	世界 GDP 指数	中国 GDP 指数
1984	232.7	261.4	274.1	62.3	170.0
1985	293.66	273.5	422.5	64.5	192.9
1986	345.28	309.4	429.1	66.6	210.0
1987	372.21	394.4	432.1	69	234.3
1988	372.21	475.2	552.7	72.1	260.7
1989	376.51	525.4	591.4	74.9	271.3
1990	478.32	620.9	533.5	75.6	281.7
1991	532.33	719.1	637.9	76.7	307.6
1992	551.46	849.4	805.9	78.4	351.4
1993	576.20	917.4	1039.6	79.8	400.4
1994	861.87	1210.1	1156.1	82.5	452.8
1995	835.10	1487.8	1320.8	84.8	502.3
1996	831.42	1510.5	1388.3	87.7	552.6
1997	828.98	1827.9	1423.7	91	603.9
1998	827.91	1837.1	1402.4	93.1	651.2
1999	827.83	1949.3	1657.0	96	700.9
2000	827.84	2492.0	2250.9	100	759.9
2001	827.70	2661.0	2435.5	101.5	823.0
2002	827.70	3256.0	2951.7	103.5	897.8
2003	827.70	4382.3	4127.6	106.3	987.8
2004	827.68	5933.2	5612.3	110.6	1087.4

2005	819.17	7619.5	6599.5	114.5	1210.4
2006	797.18	9689.4	7914.6	119.1	1363.8
2007	760.40	12177.8	9559.5	123.6	1557.0
2008	694.51	14306.9	11325.6	126.3	1707.0
2009	683.10	12016.1	10059.2	123.8	1862.5

数据来源：人民币汇率（直接标价法，年平均价 USD \$100）、出口总额（亿美元）、进口总额（亿美元）、中国 GDP 指数（1978=100）见《中国统计年鉴 1995-2010》、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世界 GDP 指数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www.unctad.org, 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2000=100。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证分析之前要判定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否则容易引起虚假回归。ADF 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c, t, k)	DW 值	ADF 统计量	5%临界值	1%临界值	结论
lnEX	2	(0, 0, 1)	1.83	-5.76	-1.96	-2.67	I(2)*
ln y _f	2	(0, 0, 1)	1.62	-3.64	-1.96	-2.67	I(2)*
ln e	2	(0, 0, 2)	2.16	-6.05	-1.96	-2.68	I(2)*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 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平稳性检验。

表 3 JJ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 值)	10%临界值	$\lambda - \max$ 统计量 (P 值)	10%临界值	协整个数
0.62	35.17 (0.05) *	32.27	22.96 (0.04) *	20.05	无
0.29	12.21 (0.43)	17.98	8.09 (0.54)	13.91	至少 1 个
0.16	4.12 (0.39)	7.56	4.12 (0.40)	7.56	至少 2 个

*表明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 值为伴随概率。

表 4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c, t, k)	DW 值	ADF 统计量	5%临界值	1%临界值	结论
lnIM	1	(c, 0, 1)	1.44	-4.30	-2.99	-3.74	I(1)*
ln y	2	(0, 0, 1)	1.62	-4.41	-1.96	-2.67	I(2)*
ln e	2	(0, 0, 2)	2.16	-6.05	-1.96	-2.68	I(2)*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 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平稳性检验。

表 5 JJ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 值)	5%临界值	$\lambda - \max$ 统计量 (P 值)	5%临界值	协整个数
0.787	48.08 (0.00) *	35.01	37.21 (0.00) *	24.25	无
0.362	10.88 (0.40)	18.40	10.79 (0.33)	17.15	至少 1 个
0.004	0.09 (0.76)	3.84	0.09 (0.76)	3.84	至少 2 个

*表明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 值为伴随概率。

我们把实证数据分成两段处理。我们首先使用 1984-1995 年数据进行回归。各项检验指标表明模型的效果很好，其模型如下：

$$\ln EX = 4.13 \ln y_f + 0.5 \ln e - 14.46 + [ma(3) = 0.99]$$

$$\begin{array}{cccc} (4.40) & (2.72) & (-4.81) & (9.27) \\ R^2=0.99 & D.W=2.11 & S.E=0.048 & T=12 \end{array}$$

$$\ln IM = 1.59 \ln y - 0.4 \ln e + [ar(1) = 0.81] + [ma(4) = -0.97]$$

$$\begin{array}{cccc} (19.47) & (-5.48) & (3.72) & (-31.74) \\ R^2=0.99 & D.W=2.08 & S.E=0.033 & T=12 \end{array}$$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1984-1995年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 E_x 为0.5，进口商品价格弹性 E_m 为0.4， $E_x + E_m = 0.9 < 1$ ，因而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

同理，我们再对1996-2009年数据进行回归，其模型如下：

$$\ln EX_t = 4.95 \ln y_{f_t} + 2.01 \ln e_t + 0.53 \ln EX_{t-1} - 32.65 + [ar(4) = 0.26]$$

$$\begin{array}{cccccc} (3.94) & (4.34) & (3.56) & & (-5.97) & (2.94) \\ R^2=0.99 & D.W=2.26 & S.E=0.068 & & T=14 \end{array}$$

$$\ln IM = 1.79 \ln y - 0.62 \ln e + [ar(1) = 0.64] + [ar(4) = -0.48]$$

$$\begin{array}{cccc} (17.38) & (-5.95) & (2.73) & (-2.49) \\ R^2=0.98 & D.W=1.8 & S.E=0.1 & T=14 \end{array}$$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1996-2009年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弹性 E_x 为2.01，进口商品价格弹性 E_m 为0.62， $E_x + E_m = 2.63 > 1$ ，因而中国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四、中国贸易条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长时间内实施“出口导向”经济战略，经济高速发展，国际贸易收益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伴随着价格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

表6 1985-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数据

年份	NBTT	TB	年份	NBTT	TB	年份	NBTT	TB
1985	92.6	-448.9	1994	102	461.7	2003	98	2092.3
1986	85.1	-416.2	1995	101.9	1403.7	2004	92.4	2667.5
1987	94.5	-144.2	1996	105.9	1019	2005	86.2	8374.4
1988	90.7	-288.4	1997	110.2	3354.2	2006	82.6	14217.7
1989	102.2	-243.8	1998	110.6	3597.5	2007	80.5	20171.1
1990	102.1	411.5	1999	104.1	2423.4	2008	73.9	20868.4
1991	101	428.4	2000	100	1995.6	2009	79.7	13411.3
1992	103.1	233	2001	102.2	1865.2			
1993	101	-701.4	2002	102.2	2517.6			

数据来源：NBTT（价格贸易条件）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www.unctad.org, 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line, 2000年=100；TB（进出口差额）见《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0》、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单位：亿元人民币。

图1 历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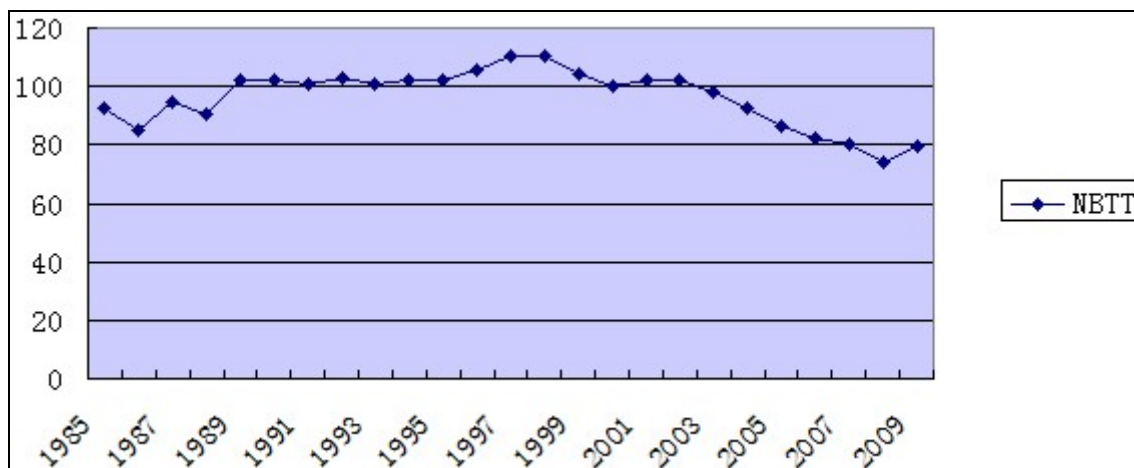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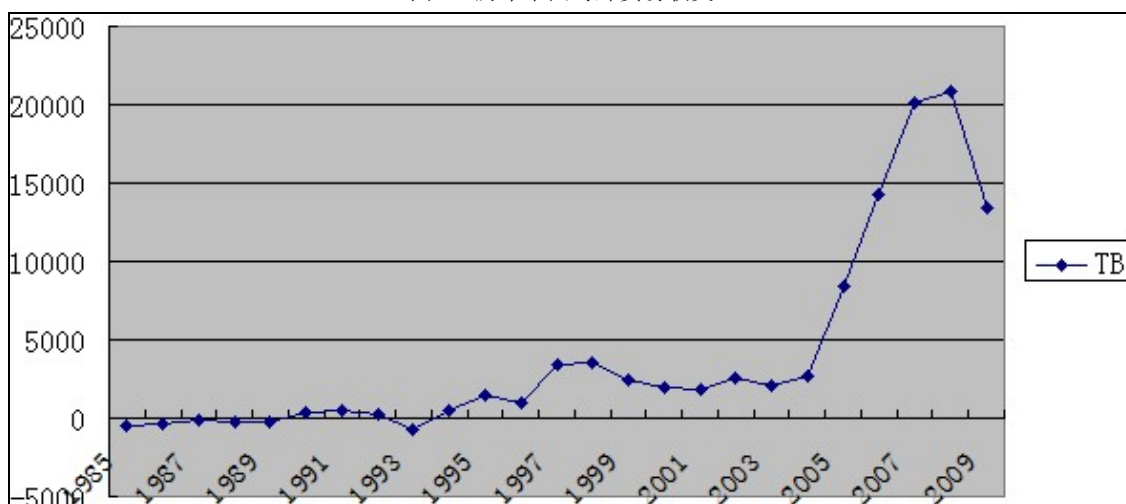


图2 历年中国对外贸易收支



从图中可以看出, 1985-1996年, 中国贸易条件呈持续改善趋势,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收益也持续增加, 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同方向变动; 而1998年前后, 贸易条件呈持续恶化趋势, 但国际贸易收益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以更加猛烈地势头迅速增加, 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反方向变动。1996年是我国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转折点, 而恰好也是在这时段前后, 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同室操戈。1996年以前, 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 贸易条件理论在当时仍然使用, 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变动是一致的。1996年以后, 中国开始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贸易条件在宏观层面上失去了解释能力, 表现为贸易条件恶化但贸易利益持续快速增长, 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反向变动。

五、总结

普雷维什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存在其理论局限性, 其赖以成立的经济前提是世界经济体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然而当今世界经济体(如中国)大体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贸易条件恶化论”已不在适用, 这由此提醒我们在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当今经济现象时, 应当谨慎考察其理论成立的经济环境和前提假设是否和当今经济现实相符, 否则将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张烨. 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2002
- [2]赵玉敏、郭培兴、王婷. 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 2002,(7)
- [3]黄满盈. 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D].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 [4]李汉、君孙旭.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趋势与出口商品结构——基于 1981-2007 年的时序数据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9,(3)
- [5]刘巍.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到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1952 年以来中国经济态势初探[J].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2011,(1), 见 <http://www2.gdufs.edu.cn/wtoreserach/xueshuchengguo/dongtai9.pdf>
- [5]Prebisch,R.,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J],Economic Bulletinfor Latin America,No.7,1950,pp1-22
- [6]Singer,H.W.,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May 1950, pp473-485
- [7]J.N.Bhagwati.1958.Immiserizing Growth[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No.3.

The Premise of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is Supply-constraints System

--The discussion based on Chinese Economics Syste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Chen zhao Ye Jingcheng

Abstract:The premise of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is supply-constraints system.When the world turns to demand-constraints system,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no longer applies.Under demand-constraints system,there aren't any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terms of trade and trading gains,terms of trade deteriorates while trading gains increases.When using 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to evaluate international trading performance and trading gains,we must make sure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conforms to its premise.

Keywords:Deteriorating Trade Terms Theory; Terms of Trade;Chinese Economic System;Premise

作者简介:

1. 陈昭, 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其他信息同前)。
2. 叶景成, 男, 广东佛山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2009级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史。地址通讯: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联系方式: yejingcheng11@qq.com, 13794080627。

陋室随笔：Cliometrics研究者的起步“装备”与研究目标^①

刘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计量经济史研究者起步的必须要具备哪些能力？笔者以为，要有四个本事：历史学的阅历——经济史实；经济学的修炼——经济理论；数学的功底——计量方法；统计学的技能——经济数据。第二，计量经济史研究的目标什么？笔者感觉有二，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和修正某些经济学理论。前者虽难但稍显容易，后者难上加难，是计量经济史研究的高尚境界。

关键词：计量经济史

Cliometrics——计量经济史，这个学科名称一写出来，就被很多人误解为中学课本的历史一类的东西，。自恃自己逻辑分析能力高深的人会叹气道：“唉，我最讨厌背诵了，我是理科出身”，云云。

还有人以为这个学科是计量经济学的历史，即《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相当于化学史、数学史等等。

都不对，计量经济史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目的有二：其一，发现历史上同类或近似的经济现象的后果，以及政府调控措施成败之经验训；其二，丰富和修正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

举例来说，目前，世界级的金融海啸导致了一场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龙头美国的经济好转与否、何时走出危机，是经济学人无不关注的。我们在书、报、网上可以看到做预测的中外经济学大腕不下几十人，基本上是“一两年说”、“三五年说”、“美国从此衰落说”。依据何在呢？都没有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就更多了，成思危老先生日前认为，2010年走出低谷，也不知有何依据。如今已是2011年了，奥巴马也不能说美国经济现在真的走出低谷了。

这样的任务，必须交给计量经济史来完成。我们最近正在做着美国1919~2008年的周期研究，我们在这个研究中，着重做GDP、Ms和财政支出的三个周期研究。观察在每一个周期的底部，财政政策出手之后，几期之后Ms开始增长、几期之后GDP走出低谷和几期之后达到或超过低谷前水平。各个周期中的节奏不会完全一致，那么，美国财政支出的力度（G/Y）与走出低谷的数量关系是怎样的。这是我们研究的大致思路，具体做，比较复杂，从前提假设的抽象开始，从90年经济发展的故事中推出逻辑函数，搜寻数据做计量模型……

完成了这个研究，才能大略地做出美国大约几年走出低谷的有依据预测。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存度一看便知，美国是世界经济的老大，美国不走出低谷，中国也好不到哪儿去。

人类经济活动缺乏实验性，不像物理、化学那样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实验，经济活动的实验室就是既往的经济活动，实验报告就是世界经济史。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束之高阁而苦

^①本文是笔者近年来从事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几点体会，近乎直觉，脱口而出，文字既非书面语体，逻辑亦非无懈可击。不成体统，贻笑大方，敬请各位前辈和同仁雅正。

思冥想、信口开河，实乃不智。

再举一例。国际贸易学理论中有著名的“贸易条件学说”，是19世纪经济学家穆勒的贡献。该学说认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途径有二：提高出口价格和压低进口价格。直到今天，中国有关当局还在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焦虑着呢！而二十世纪初罗宾逊夫人的“马勒条件”恰好与之相反，本币贬值（即出口降价进口提价）可以改善国际收支，即对自己有利。《国际贸易学》课程与《国际金融学》课程就打起来了！但是，大学的经济学院教学楼里，国际贸易教授在娓娓道来“贸易条件”，国际金融教授在满黑板推导“马勒条件”，同一个班级的大学生们听完了不以为然，几乎无人认为有冲突！同时，国际贸易的教授自己和自己也在打架——讲完了贸易条件不久，就讲“倾销与反倾销”。倾销是什么？低价出售啊！对自己国家意味着贸易条件恶化，对贸易伙伴国意味着贸易条件改善。学雷锋啊！看看伙伴国什么态度——拼命地反倾销，就是不同意他自己的贸易条件改善和别人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世界简直回到尧舜境界了！！究竟是谁错了？穆勒错了？他可是大经济学家，不要轻易下结论。罗宾逊夫人错了？同理，也不要随便乱说。商人和各国政府错了？这都是利益驱动的理性人，不可能这么蠢。问题出在哪儿呢？

我们在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国经济态势做了计量分析之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问题出在前提假设上：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即销售是大问题的时代——马勒条件成立，倾销反倾销都是理性行为。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即短缺经济，销售不成问题，能不能买到商品才是问题——贸易条件成立，东西就这么多，供给跟不上来，所以，出口卖高价才可以提高利益。

至此，我们可以修正贸易理论了，起码，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以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需求约束时代了，凯恩斯教授早就有定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更早，我们的判断是，自世界上第一个反倾销法（加拿大190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时段可能是两种供求态势转变的时期（英国也许更早）。在那个时段内，各个发达国家渐次开始为销售发愁了，于是，贸易条件就可能不适用了：前提消失了，结论就不存在了。穆勒时代，绝无类似今天的倾销与反倾销——虽有时不时结构上的过剩，但总量上没有可以倾销的东西啊！贸易条件就是考量贸易绩效的尺度了。

这样的研究，必须由计量经济史来完成。

研究计量经济史需要有怎样的学术储备？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你要有良好的近代史——当代史学修养（因为我们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所以从近代开始，中世纪不是市场经济，所以还没有什么好办法研究），而且不断补充最新的“历史”。因为计量经济史是为当代经济的预测和调整献计献策的，所以，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从遥远的某一时点一直到眼皮子底下的，那“遥远的某一时点”可以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皮子底下”的事是不断进入“历史”、不断更新的。

我们要研究这一宏大的时段中的问题，必须对此谙熟。比如，你研究澳大利亚，你连那里有袋鼠都不知道，说明你对研究对象太不了解，估计你的研究是不会有建树的。既然是研究计量经济史，你看，这个偏正词组的中心词是“史”，那么，你对大时段的历史就必须有兴趣，必须愿意去读书。我们广外大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接下来要做的课题是《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史（1919~2008）》，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人员首先要过的一关是熟知美国自一战结束以来的故事，关乎经济的、看似无关乎经济的重要事件都要清楚，多读书。我虽然是历史学硕士，但我们念书的时候也没有《剑桥美国经济史》、《美国货币史》这一类的中文书，也都需要补课。不同的是，我具备历史学功底，知道读这些书的要领。

其次，你要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而且，能盯住经济学前沿理论。我们研究的是经济史，要从历史的经济运行中得出有意思的结论，所以，你的研究框架必须是经济学的。否则，不要说研究结论，就连你找的“资料”都是驴唇不对马嘴、南辕北辙的。我师姐王玉茹教授

在给我的书所作的序言中虚拟的例子很说明问题，一语道破了目前学界的窘境。

譬如，历史学界有位学者（真有其人其事，不过，我隐去他的名字）研究过近代中国的汇率变动与中国出口的关系，他还算是看过一点经济学的书（如，知道本币贬值可以促进出口），但看的不多，理解的肤浅。他根据某一时段中国的出口额和汇率的对应关系得出结论：中国的货币贬值不能使出口增长。殊不知，一国的出口至少是外国收入和汇率两个变量的函数（即，出口额增减的重要原因有两个：外国收入和汇率），而且，外国收入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出口，就是外国人的进口，即外国人买我们的东西，这首先取决于外国人的收入高低，即他们有钱没钱，其次才是经汇率换算后的价格高低，再次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学的教科书是分节阐述理论的，说到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时，假定其他自变量不变。但你在使用理论分析框架时，要把所有涉及到的变量都视为变化的。

而那位历史学教授研究的时段恰好是世界经济下滑、外国收入下降的时段，如果不是中国本币贬值，出口会更少。两个变量放在一起可以用肉眼观察趋势关系，三个变量放在一起就不一定是肉眼可以观察出来的了，需要去算。

学习经济学理论要比读历史书费劲多了。一个文化修养较好的人，看历史书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学习经济学理论却是有“门槛”的，没有基本的数学功底是不行的，这一点我的体会深刻极了！如果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一书的书皮撕掉，你真的不知是数学书还是经济学书。因此，我的看法是，从经济学专业转入计量经济史相对比较容易，而从历史学专业转入计量经济史相对比较困难。

再次，在前面的两个条件具备的同时，你还要掌握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因为，你根据历史上的经济运行中的大事，用经济学逻辑分析得出了某种结论之后，这种结论是否受到这一时期的全部经验支持，需要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千万不要用历史学的一贯做法——提出一个观点，附上三条有利的史料。这是举例法，或称不完全归纳法，不科学的。我念历史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套，比如，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理由是，第一条史料：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第二条史料：张勋复辟也失败了；还有一条史料，想不起来了。反正，这就这个路数。至于辛亥革命之后封建观念、封建体制的长期存在就视而不见了，对这个观点不利的史料不说。

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是，穷尽时段内各个时点上的所有数据，计算出均值和方差，用数据说明某一类事物对他类事物的影响大小或有无影响。这种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不会一个人研究一样，避免无谓的“学术争论”。这种方法大概适合于经济史，社会史也可以做。比如，我看过一篇国内学者的论文，作者名字和文题都忘了，大意是这样的：该文对“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用计量方法做了实证研究，做了大量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谦虚不能使人进步，但也不会显著地使人落后，骄傲使人进步。呵呵，有点意思。还有一位苏联学者，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黄河泛滥关系的研究做了数量分析，结论是，农民起义的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黄河就比较稳定；越是和平时期，黄河泛滥就越频繁。于是，黄河泛滥与农民起义负相关，还分析了相关的机理，很有说服力。这是我念本科时读的一篇俄文文献，忘了出处了。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弄懂，弄懂了也未必会做计量经济模型。我们搞的“傻瓜书”可以帮你做，但你要先看懂计量经济学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傻瓜书写到了单整、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做法，相当于《中级计量经济学》的水平。该书没有涉及面板数据的处理，等过一阵子闲一点再接着弄。

最后，要有充分的数据资料。对于计量方法来说，没有数据就是无米之炊。国外的数据资料做的不错，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日本的数量经济史学派都把数据向前回推到18、19世纪了。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史数据就比较差，前辈学者没做这个工作，我们还得自己去收集、整理和估算数据。这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必须得有人做才行。比如，我们正

在做的是“近代中国 50 年的 GDP 估算”和“近代中国 50 年的货币供应量估算”两个大课题。拿第一个来说，这是经济研究最为基础的数据，没有这个时间序列数据的话，你连近代中国的经济是增长的还是衰落的都不知道，还能研究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供当代经济政策借鉴？1887 年~1936 年应该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正常的时期。从洋务运动的近代化经济起步，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社会相对稳定。要说自由经济，那一时段应该是最自由的经济，充满了起步时期的经验教训。但是，这 50 年间，有 GDP 数据的年份一共 9 个，缺 41 个。怎么办？必须先来估算 GDP。日本的大川一司教授是根据日本的税收数据和 GDP 的关系倒推出来的数据，我们国家没有税收数据记录。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英国人赫德在中国当了 40 多年的海关总税务司，做了大量的进出口数据记录。翻一翻近代中国的海关关册，看得出相当专业。这样，我们根据一国进口、汇率、关税税率和国民收入的关系和现有的 GDP 离散数据，可以建立模型，外推 GDP，再根据其他资料做出验证和修正即可。不这样做，就可能永远没有近代中国的 GDP 时间序列数据。

怎么样？够麻烦吧？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工作着，一边做外国的宏观调控历史经验教训研究、理论修正研究（很少能碰到这么运气的题目，像前面说的贸易条件学说的修正），一边做着近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不太乐观，不等把 GDP、Ms、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劳动力、工资等数据弄完，我就该退休了。可也问题不大，陈昭、袁欣、郝雁、刘红娟他们都能做。再说，还会有后起之秀的，中国说不定也能出几个大川一司的。

总而言之，你要有四个本事：经济史实、经济理论、计量方法、统计数据。这样，你就可以研究计量经济史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这要经过一番修炼才行！边干边学，而不是把四个本事备齐了再干，干中学，学得更扎实，效率更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选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要赋予古老的经济史以新的意义，我们的选题要抓住两个方面。

第一，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世界经济史是人类经济活动宝贵的实验报告，经验教训暗含其中，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有极高的政策价值。例如，到 2007~2008 年，中国连续实现了巨额外贸顺差，导致了本币升值、国内市场流动性充裕、股市楼市持续升温、通胀压力凸显等问题的出现。于是，各方面开始视外贸顺差为大敌，以降低顺差增速为工作绩效，各家各派降低顺差增速的政策建议纷纷登场……

巨额外贸顺差是不是有害无利？利弊如何权衡？如果有害，应该从上游——外贸顺差——解决问题，还是应该从下游——本币升值压力和国内价格压力——解决问题？这在中国前无古人的问题。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后者可以用实验方法解决重要的选择性问题，经济学方案不可能实验，只能在经济发展史中寻求科学性强的方案。其实，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许多国家都走过相似的道路，当年英国在重商主义思想支配下，曾有过巨额外贸顺差，德国、日本战后都曾外汇储备剧增导致本币升值，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导向”阶段都曾追求外贸顺差。顺差给他们带来的利弊分布如何？他们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你可以做出历史经验的判断，按当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大环境修正历史模型的前提假设、增减必要的变量，得出对中国外贸健康发展有利的政策建议。

其实，中国近 30 年在市场经济之路上遇到的问题大都可以见诸中外经济史，将其束之高阁而苦思冥想，实乃不智。

第二，修正某些经济学理论。这是最高级的学问了，这体现了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之说，真的不好做。同时，也没有那么幸运——总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前面说过了“贸易条件”学说一事，这是百年不遇的，而且，还是在向松祚的《不要玩弄汇率》一书的启发下，深入研究到了“供给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上去的。接下来，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 30 年代经济运行时候，想到了货币政策这根“绳子只能拉车不能推车”的问题，正在深入研究，目前尚未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不多说了。

Essay on the Basic Necessity and Research Target of the Cliometrics studies

Liu wei

Abstract: Two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on one hand ,what capaciti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cliometric researchers at the beginning? As far as I know, four kinds of capacities:1. history especially economic hisstory; 2.economy especially economical theory; 3.math especially econometrics; 4.statistics especially economic data. On the other hand, what is cliometric research for? Two aspects: one is to search for the method to slove the chinese economic problems; the other is to improve and rectify some economic theory. The former is hard but easier,and the latter is harder which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cliometric research.

Key words: Cliometrics